

日治時期日人對臺灣客家的社會印象之研究^{*}

陳俊安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研究生

* 本文初稿曾以「日治時期日人對臺灣客家社會印象之探究」為題，於第十一屆客家研究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2011年10月17日於國立中央大學）上宣讀。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之指正與寶貴建議，本文獲益良多，特此致謝。

摘要

日本領臺初期清代臺灣方志成了官方研究臺灣的重要依據，方志中的客家書寫，以及乙未之役日人對客家的抗日行為，使官方對於客家產生了負面書寫。日本領臺50年期間，日本對客家描述也有不同的變化，在地日本警察的實際客家記錄明顯與官方有落差。

民間日人對客家的認知原則上仍建立在官方論述的基礎上，但民間對客家觀察面向則較官方廣泛。當時的媒體曾對客家做持續性報導，描繪出客家的社會現況，期間雜誌則有深入性報導，顯示日人對客家的生活、文化、產業等感興趣。

本文分析日人對於客家印象的來源概分為兩大類：一、為史料文獻，二、為實際接觸的經驗。早期日人對於客家認知沿襲清代方志及西方文獻的看法，日警則依實際管理客家聚落的經驗而有較完整的客家記錄。日治時期臺灣客家社會印象是由日本殖民者以選擇、形塑、收編等方式所形成。

關鍵字：客家概念、客家印象、清代方志、新竹州警察、義民祭

壹、前言

早期日人對於臺灣各族群的了解，以清代臺灣方志及西方臺灣文獻做為基礎，¹方志成為日人認識客家的方式之一，方志有關客家的書寫與乙未之役客家對日軍的抵抗行為，加深了日人對客家的負面印象。後續研究臺灣的日人，大量地以初期日人的臺灣研究為範本，客家負面的形象因此被沿襲保留。然而，警察對於客家地區的社會現況似乎不再拘泥於文獻記載，就其業務所及較能呈現日人對客家的社會印象。

分析日人官民對於客家印象的來源概分為兩大類：一、史料文獻，二、實際的客家經驗。在缺乏具體客家經驗時，清代臺灣方志及前人的研究成果成了沿襲的依據；警察對客家的印象最為貼近客家的社會現況。客家社會印象優劣評價則由殖民者依當時的政治、社會、經濟等來決定。日治末期日本對外關係緊張之際，依「人力資源論」²將可為日本所用的經濟、產業、人心及道德等，進一步以選擇、形塑、收編等方式進行，客家傳統文化的義民精神亦成了日人收編之列。藉由日人的客家社會印象也可以觀察到，日人的工具性客家印象的描述，反應出其殖民主義的本質。

客家在中國或臺灣的社會描述隨著時空的改變，有不同程度的論述與解讀。李文良在〈清初臺灣方志的「客家」書寫與社會相〉³與另一篇有關客家與義民的研究中指出，⁴清朝藉由族群民心的收編，減少行政管理資源的挹注，穩固客家族群對清政府的效忠。日治末期似乎也可

-
- 1 吳文星，〈日治初期日人對臺灣史研究之展開〉，《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輯》（臺北：國史館，1998年12月），頁2020。
 - 2 1938年日本教育審議會，設戰時教改革基本方向，明定以思想、產業、國防等做為發展國力的方法，其中以道德最為重要。參閱寺崎昌男編，《總力戰體制教育—皇國民「鍊成」理念實踐》（東京：東京大學出版，1988年），頁1。
 - 3 臺灣方志書寫權並非掌握在客籍之手，而是出自於另外漳泉人之手，旨在於界定族群的邊界，也反應書寫者內心的想法與觀感。參閱李文良，〈清初臺灣方志的「客家」書寫與社會相〉，《臺大歷史學報》，期31（2003年6月），頁150-153。
 - 4 臺灣客家族群為求自保，在頻頻動亂的民變中選擇站在代表文化正統的王朝一邊，在民變中藉由效忠的行動獲得官方的肯定。參閱李文良，〈從「客仔」到「義民」：清初南臺灣的移民開發和社會動亂（1680-1740）〉，《歷史人類學學刊》5：2，（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廣州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2007年10月），頁17-20。

見殖民政府以此種工具性的方式來收編客家。大正6年（1917年）日本東亞同文書院編纂的《支那省別全志》，由該院學生在中國進行實地調查，其中亦包括中國客家聚落的調查。⁵昭和4年（1929年）日本外務省刊行《華僑研究》，該文雖以中國及南洋的華僑為主，對於客家南洋遷徙、開墾、人口分佈及經濟發展等，亦有大篇幅的介紹。⁶此外，山口縣造、⁷服部宇之吉、⁸森清太郎⁹等學者等，對中國的客家社會發展也有概略的說明。昭和5年（1930年）臺灣客籍學者彭阿木任職東亞同文書院囑託，即進行客家調查研究，其內容主要以梅縣為中心，說明客家意義的由來、語言、生活、信仰、習俗、族譜、人數及分佈。¹⁰

飯島典子所著的《近代客家社會の形成：「他稱」と「自稱」のはざままで》，第一章即以歷史的經緯探討他者對中國客家社會的描述，其中提到日人對客家的調查是以語言研究做為出發，接著調查客家的社會文化，作者以西方傳教士在華南的報導、清代華南地區方志、日本官方對華南的調查以及日本學客對客家的研究做為基礎，分析不同時期的客家社會經濟文化社，對的客家向外發展的影響，並說明客家對外參與中國的革命、海內外的移民對中國的影響及文化擴張的影響。¹¹從上述的研究中看，日人對中國有較具體的客家研究，惟仍不見日人對於臺灣客家的社會印象，目前尚無探討日人對臺灣客家研究的成果。因此，以飯島的研究為基礎，提供一個觀察日治時期日人對臺灣客家印象的範本。

本文從日人的臺灣研究史料、文獻、報紙及客家地方警察看法來分

5 第十四卷福建省三卷，該三卷特別詳述客家聚落、地域歷史、地理、人口、交通、產業與風俗參閱東亞同文會，《支那省別全誌》（東京市：東亞同文會，1918年）。

6 飯島典子，〈日本人看客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2007新竹義民節慶、文化與觀光國際研討會大會》，新竹：明新科技大學，2007年，頁60-12。

7 介紹客家在中國參與國共的革命運動。參閱山口縣造，〈客家と支那革命〉《東洋》，期33（1930年10月）。轉載自飯島典子《近代客家社會の形成：「他稱」と「自稱」のはざままで》（東京：風響社，2007年），頁16-18。

8 著作介紹客家族群性受環境地理的影響，以及與其他族群的關係，並將客與蛋民混為一談，對客家的印象顯然不太了解。參閱服部宇之吉，《支那の國民性與思想》（東京：京文社，1926年），頁26-30。

9 森清太郎自1905年移居廣東，經常在日本報章雜誌發表華南的文章，但著作將客家與廣州蛋民混為一談，也說明其對客家的陌生。參閱森清太郎，《嶺南紀勝》頁63-64。

10 彭阿木在《支那研究》雜誌發表〈就客家的研究〉，轉載飯島典子，《近代客家社會の形成：「他稱」と「自稱」のはざままで》（東京：風響社，2007年），頁36-37。

11 飯島典子，《近代客家社會の形成：「他稱」と「自稱」のはざままで》（東京：風響社，2007年），頁16-18。

析，在史料的選擇，從三個方向著手，一為日本的臺灣研究史料，二為臺灣總督府所發行的各項臺灣研究史料與地方街庄所編纂的史料，三為日治時期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及媒體報導。藉由不同階級及領域的日人的客家論述，爬梳日人的臺灣客家社會印象。有關警察對客家的記錄，散見於《臺灣警察時報》、《語苑》、《臺法月報》、《新竹州時報》以及各類「臺灣」之研究書籍，此類有關客家的描述不僅零散、較無主題性，也缺乏連貫性，但仍有檢視日人對客家社會之印象之價值。筆者唯限於研究時間以及篇幅，本文在選擇有關警察的客家印象之史料，目前暫權以新竹州文庫所出版的《警友》雜誌為主要研究史料，因該雜誌有關客家之錄記最為豐富與詳實，從大正14年（1925年）第10號開始即有客家資料呈現，較完整的資料則從昭和9年至16年（1935 - 1941年）止，此間7年長期刊載有關「廣東語研究」（客語）之文章，這類資料有助於瞭解日本籍警察對臺灣客家社會的印象，惟其不足處仍局限於新竹州地區，其他地區待日後再以新的史料補足。本文主要探討的問題為：日治初期日人對客家的負面形象如何產生？清代方志是否影響了日人對客家的觀感？客家民間信仰、文化與習俗等如何被日人所評價？日人如何將客家生活文化形塑成符合日本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

貳、日本官方對臺灣客家的調查

日人視客家為臺灣各族群中的一支，因此其對客家的研究並非單獨成立的研究，除了初期受西方文獻的「Hakka」概念、更深受清代臺灣方志中的客家書寫所影響。但在實際殖民政府的管理下，地方行政官員對於客家似乎有不同的看法，呈現不同階級的日人的客家印象。

一、日本官方對臺灣客家調查的描述

（一）初期的客家概念—西方文獻的影響

日人對於客家概念仍以「粵」、「廣東人」視之，對「客家」一詞還是十分陌生。然而在學術的看法上，初期日本學術對於臺灣族群

內部瞭解部份依舊透過西方學者或傳教士的相關對臺著作，明治28年（1895年）德國猶太裔學者路德利斯（Ludwig Riess）在「東京德意志自然－民族東亞學會」做〈客家渡台原委〉的發表演講¹²，此為其對臺灣的眾多研究中與客家議題有關的研究報告。

分析利斯的〈客家渡台原委〉約略得知，其所用資料主要來自荷蘭殖民當局、教會以及歐洲探險家之臺灣紀錄，與客家有關的論述並不詳備，甚至和一般通說有異。例如，利斯出身猶太裔，他亦把客家之南遷與猶太人之遷移相比，與事實有些出入：

客家卻對自己種族之出處不明，甚至連自己祖先之埋葬地也不知曉之流浪的客家族，受到常以家族關係鞏固而自豪的一般中國人之輕侮…。在中世紀時代，居住在德意志的猶太種族，因蒙受十字軍之影響，半數以上的人們退隱到波蘭，雖不完整，卻也在該地形成一小市民集團。¹³

上述說法以目前來看的确有些出入，但在當時此論述已讓日本學界對於客家有新的認識，日本對「客家」詞彙亦以德文之「Hakka」來套用。值得注意的是，吉國藤吉在《臺灣島志史》第三章「客家渡來の顛末」文中，直接以「客家」做為族群的敘述，而非以「粵」或「廣東人」做為族群稱謂。¹⁴日人對於史料的選擇似乎影響了其對客家之稱謂為「客家」亦或「粵」。

（二）清代臺灣方志的引用

明治28年（1895年）正值臺灣兵馬倥傯之際，日本京都江馬達三郎譯述《臺灣史料》依據清代文獻《東征紀事》、《征台紀略》及其他見聞等，成冊目的在藉由介紹臺灣風土、政治、兵事、民變及清政府官

12 第一次為1895年6月26日，第二次為同年9月25日。參閱戴國輝著，《臺灣結與中國結－羣丸理論與自立、共生的構圖》（臺北：遠流，1994年），頁206。

13 〈客家渡臺原委－臺灣當為東南亞海寇之避難所（1368－1600年）〉原文為德文收錄於《臺灣島史》（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第三章，第413－417頁。參閱戴國輝，《臺灣結與中國結－羣丸理論與自立、共生的構圖》（臺北：遠流，1994年），頁206；吉國藤吉，《臺灣島志史》（東京：富山房，1898年），頁41－42。

14 吉國藤吉，《臺灣島志史》（東京：富山房，1898年），頁41－42。

員對平亂的歷史，期望有助日軍早日戡亂，文中提及朱一貴、林爽文事件及械鬥之事，但著作所引用史料則決定了其對臺灣史的看法及以客家的認知，作者以李元度的〈施提督世驃破臺灣朱一貴〉、姚瑩的〈趙制軍覆臺灣兵事言書〉¹⁵作為材料，對臺灣族群的民變及閩客的族群性格的討論付之闕如，更遑論對「客家」的了解。

明治33年（1900年）拓務省文書課編輯一本《臺灣歷史考》，意欲進一步有系統地向日本人民介紹臺灣，為日後南進臺灣的日人提供具體的概念。岡田東寧曾隨軍參與征臺之役，一路從基隆到臺南可謂無役不與，其將所見所聞編著《臺灣漫遊記程》，對於臺灣有實質的在地經驗，並蒐集清代方志編纂此書，以編年體的方式呈現，有關中文史料多為清代方志，整理如下表1。

表1：《臺灣歷史考》引用方志書目。

參考書目	臺灣府志	噶瑪蘭廳志	平台紀略	東瀛外記
	臺灣縣志	鹿州全集	鳳山縣志	資治新書
	淡水廳志	東征集	欽定吏部則例	東華錄
	彰化縣志	集說詮集	恩赦條款	

資料來源：岡田東寧，《臺灣歷史考》（東京：拓殖務省文書課，明治33年（1900年）），頁6。

岡田在介紹臺灣客家的部分已開始以「客家」與「粵」並用，雖其曾在臺停留一段時間，但清代方志顯然對其影響仍然大於實際經驗。岡田認為客家最早是隨鄭成功來臺開墾的潮惠之民，對於客家的看法仍沿襲清代的史料，分類械鬥也是著作認識客家的媒介，岡田對於分類械鬥之了解也僅限於其所掌握的方志，主要是《彰化縣志》、《淡水廳志》中的分類械鬥為史料解釋客家與分類械鬥的因果，惟朱一貴、林爽文事件，岡田對客家奉大清牌之舉譽為義民，前者出：「下淡水客家庄民候觀德、李直三 etc 大清義民舉旗奉皇帝萬歲牌，聯莊拒賊」¹⁶；後者因其

15 江馬達三郎譯述，《臺灣史料（第下編）》（京都：村上勘兵衛，1895年），頁1；7-9；30。

16 岡田東寧《臺灣歷史考》（東京：拓殖務省文書課，1900年），頁166；168。

所參考《彰化縣志》的限制，對於北部客家義民則是隻字帶過。

二、臺灣總督府臺灣研究的客家描述

（一）清代臺灣方志客家書寫對日人的影響

總督府研究臺灣多以清代臺灣方志為基礎，明治35年（1902年）擔任臺灣總督府囑託的伊能嘉矩、小林里平合編《臺灣年表》，該書主要的史料以清代方志為主，有關臺灣的文獻目錄，計有中文180種、日文79種、西文47種。¹⁷當日本官民熱烈投入臺灣研究時，初期的研究鮮少觸及客家。

大正11年（1922年）6月臺灣總督府成立史料編纂委員會，¹⁸其編纂委員皆可謂一時之選，甚至網羅了民間的知名臺籍商人。¹⁹從總督府修臺史之舉可看出日本著手臺灣史的掌控企圖，此由總督府對外發表的新聞稿可知：「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今日之設置，實新臺灣史對世界的宣示，同時其本質與精神亦做為後世典範之作」。²⁰總督府所彙編的《臺灣史料稿本》也為後續研究臺灣的日人提供良好基礎，然而其所彙整的清代方志及文獻鮮少論及客家，甚至帶有不少負面的描述。因此，日人在整體臺灣論述之時，客家的能見度則變的更低。參閱表2。

17 伊能嘉矩蒐集了清代的臺灣方志及相關文集，從康熙到同治年間。參閱伊能嘉矩、小林里平《臺灣年表》（臺北：小林里平，1903年），頁60 - 75）；吳文星，〈日治初期日人對臺灣史研究之展開〉，《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輯》（臺北：國史館，1998年），頁2006 - 2016。

18 「臺灣史料編纂委員會的創設」，《臺灣時報》，1922年6月 <http://p8080-140.115.130.210.ezproxy.lib.ncu.edu.tw/twjihoapp/servlet/completeOne?page=1>，2011年1月4日下載。

19 總督府就史料編纂委員會的各委員、評議員、顧問、幹事等的人員，網羅各地官員及學者，編纂委員長持地六三郎是委員，除了持地、田原、尾崎外、技師外各州內務部長等數十名，又評議員和田的府內各部局長、各州知事、廳長、佐藤少將、立野海軍大佐之外，從民間士紳21名。「史料編纂會議」，《臺灣時報》，1922年6月，<http://p8080-140.115.130.210.ezproxy.lib.ncu.edu.tw/twjihoapp/servlet/completeOne?page=1>，2011年1月4日下載。

20 「今か史料編纂の時期」《臺灣時報》，1922年6月，<http://p8080-140.115.130.210.ezproxy.lib.ncu.edu.tw/twjihoapp/servlet/completeOne?page=1>，2011年1月4日下載。

表2：《臺灣史料稿本》引用的清代書目

明史	臺灣縣志	淡水廳志	澎湖廳志	續修臺灣府志
噶嗎蘭廳志	臺灣小志	彰化縣志	臺灣紀略	臺灣外記
海上見聞錄	聖武記	東華錄	平台紀略	稗海紀遊
台海采風圖考	臺灣府志	東瀛紀事	臺灣使槎錄	閩海紀要
內自訟齋文集	國朝柔遠記	東華續錄	臺灣外記	諸羅縣志
東征集	東瀛識略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久保得二等編纂，《改隸前支那史料（二）》（出版地不詳：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出版年不詳，國圖）。

（二）官方客家描述的歷史分期

1、明治時期—沿襲清代臺灣方志客家負面書寫

觀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各項有關客家的史料，可見日人對於客家看法仍然停留在表面的統計數據，主要還是著重在人口數、分佈、語言及產業。²¹例如語言方面。明治33年（1900年）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簡稱土地調查局）編輯了「土地調查用廣東語集」，²²其內容因應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調查課所規劃，土地調查局將所需資料整理並擬定各種實用客家會話，編輯簡易的客家會語集以便土地調查官吏與地方警察使用。參閱圖一。其主要的客家語彙有二十大類，一為調查專用語。例如，數字、貨幣、斤量、尺度、農田用語、人倫。二為調查專用會話，因此，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無法清楚得知日人對客家的社會印象。

21 「廣東人種取調ノ件（元臺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73卷，1897年1月1日。

22 「土地調查用廣東語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45卷，1900年10月1日。

土地調查用廣東語集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調查課 通譯 古立昌藏譯述									
數字										壹 イ、 九 キリ 拾 シ 百 バー 千 チエン 萬 バン 半 パン 零 レン 八 パ									
貨幣										一錢 チエン 一文 一尺 チヤイ 一錢 一大 ツラン 一角 ク 十錢 一里 リイ 一元 クワイ 一圓 一鋪 プウ									
斤量										一分 ワン 一錢 チエン 一兩 リョウ 一斤 キン 一担 タン 尺 タシ 一 フン									
禮拜日										禮拜日 レイハイ 日曜 ニチヨウ									

圖1 「土地調查用廣東語集」

資料來源：「土地調查用廣東語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45卷，1900年10月1日。

明治33年（1900年）由軍方籌辦蒐集臺灣有關史料編集而成之《臺灣史料》，其目的在蒐集古今之有關臺灣的史料加以編纂整理，做為日後治理臺灣之用。²³該書認為是清朝政策因素，是影響客家來臺的人數及時期，作者更直接引用〈理台末議〉有關施琅對潮惠之惡的說法，茲節錄日文：「將軍施琅ノ世粵中惠潮ノ民ヲ嚴禁シラ渡臺ヲ許サズ蓋シ惠潮ノ地數數海盜ノ淵藪トナリラ而ノ積習未タ忘レザレバナリト。」²⁴編者認為在臺之粵族群強悍，動輒流於爭鬥，故為清朝禁止來臺。日人除受清代方志及相關文獻影響外，對閩粵族群好爭鬥的本質亦歸究於臺人盜賊的思想、功利主義、氣候及土地等因素。²⁵

23 參閱臺灣守備混成第一旅團，《臺灣史料》（東京：同志社，1900年）。

24 中文原文：「終將軍施琅之世，嚴禁粵中惠潮之民不許渡臺。蓋惡惠、潮之地素為海盜淵藪而積習未忘也。琅歿漸弛其禁，惠、潮之民乃得越渡。」參閱臺灣守備混成第一旅團，《臺灣史料》，頁293。

25 臺灣守備混成第一旅團，《臺灣史料》（東京：同志社，1919年），頁298。

明治40年（1907年）新竹廳總務課編纂《新竹廳志》，對於客家的描述也是受清代臺灣方志的影響，日人對客家的印象主要來自分類械鬥，並詳細指出客家經歷械鬥後的處境及遷移，²⁶對於影響新竹沿山地區重要的隘防事務，例如，金廣福隘、樹杞林隘、九芎林隘等，也能詳細說明隘防的佈署及人員配置數。但令人訝異的是，廳志中對此並未提及任何有關客家在隘防事務，只以地方做為敘事代表。

2、大正時期—持續的負面的客家書寫

日本領臺25年後總督府法務部編纂了一本《臺灣匪亂小史》，其目的在簡明記述事件的原委，法務部認為臺之閩粵與大陸原為血脈相連，臺地百年不靖在於清朝的無為而治（治めざるを以て治む）政策。²⁷即指責清朝治臺無方，並以：「蠢魯なる家猪も山野に放ちて其久しさに互れば竟に其性を變じて獍猛なる，獸となり強暴なる野牛も之を豢養するに馴ろれば即ち柔和なる家畜となる。」²⁸來譏諷清朝無能與臺灣人野蠻。對於閩粵族群評價甚差：「其兩族素來隱據各地反目爭鬥，原出於中國原鄉慍悍殘忍性格」²⁹如此帶有歧視的描述可知其殖民主義優越性格。

大正12年（1923年）秋澤次郎著《臺灣匪誌》，其內容與上述《臺灣匪亂小史》相差不多，作著對客家負面描述是：「輕舉妄動、附和雷同」。³⁰另外高塔學人對《臺灣匪誌》的評論亦可看出日人對客家的陌生，對於抗日事件仍以地方做為敘事對象。³¹但實際上官方對於客家族群的動向早已有所掌握，明治28年（1895年）新竹支廳長村雄上

26 《新竹廳志》在第十編〈兵燹〉的部分即詳細的敘述分類械鬥事件。例如朱一貴、林爽文事件、桃園仔、八里坌、中港鹽水港到客雅溪、咸豐4年新社大湖口中壢事件、咸豐10年北桃園械鬥等分類事件，對粵人的族群區域重整有詳細的說明。參閱新竹廳總務課，《新竹廳志》（新竹：臺灣日日新報社，1907年），頁5125 - 526。

27 臺灣總督府法務部編纂《臺灣匪亂小史》（臺北：臺灣總督府法務部，1934年），頁7。

28 中文譯文：「蠢魯之家猪置山林野放日久變猛獍之獸，強暴之野牛要是豢養馴化的話，即成柔和之家畜。」臺灣總督府法務部編纂《臺灣匪亂小史》（臺北：臺灣總督府法務部，1934年），頁8。

29 臺灣總督府法務部編纂《臺灣匪亂小史》（臺北：臺灣總督府法務部，1934年），頁10 - 11。

30 秋澤次郎著，《臺灣匪誌》（臺北：杉田書店，1923年），頁23。

31 高塔學人，〈讀『臺灣匪誌』〉，《臺灣警察協會雜誌》，號75（1923年6月），頁12 - 14。

呈民政局長官水野遵的報告提及，新竹地區的民情仍是高度不穩定：

本地人民之舉動，最初不唯與賊徒、本地紳商互有聯繫，甚或還居於重要地位。今表面上表示恭順而暗地裡卻包藏禍心者居多。6月25日以來，敵勢日熾，市民因而動搖，足可證明其絕非從順良民，故行政上困難之處，固不待言，內訌之患，亦是不少。³²

官方對於新竹地區的臺人政治動向已清楚掌握，並已了解如何化解新竹地區的反日勢力，村雄支廳長認為閩粵向來不睦，應從中區別族群做調查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本地匿藏不少敗兵，且廣東人和廈門人之間亦有不和，遂認為此時有進行戶口調查必要。廳員身戶籍調查工作，自數日前起，分頭著手進行，工作幾近完成。」³³顯然日人對於臺人抗日的因應作法，有別於清代族群離間的兩面手法，而以「法」做為處理的準則。

3、昭和時期—客家地區開發的描述

昭和13年（1938年）新竹州發行《新竹州沿革史》，由菅野秀雄編著，在談論到住民與隘防關係時，清楚地描述客家在隘防事業上所獲得的實質利益，並明確指出北埔「粵人姜秀鑾」在北埔隘防開墾的成果，以及「粵人黃南球、黃龍章」等，在苗栗南庄、咸菜硼等地所獲得的土地開發成果。³⁴菅野對於客家族群在新竹地區的開墾，以「粵人」來敘述地方開發史，說明日人已經能夠清楚的掌握閩客在區域發展的脈絡。但官方對於客家的歷史評價似乎沒有隨時間的延長而有太多的改變，菅野在談論到新竹地區的抗日及民變事件時，仍以「土匪」來論述抗日的臺人。

三、日本警察對臺灣客家的實際觀感

警察是總督府行政管理的末梢神經也是現況反應的第一線，客家

32 徐國章譯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南投：臺灣文獻，2005年），頁32。

33 徐國章譯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南投：臺灣文獻，2005年），頁33。

34 菅野秀雄，《新竹州沿革史（下）》（新竹：新竹州沿革史刊行會，1938年），頁56-58。

地區的警察對於客家的看法有更貼切的描述。整體而言，警察不再拘泥於清代方志的書寫來看待客家。日治時期臺灣各州都機關報刊，在整理了臺北州、新竹州、臺中州、臺南州與高雄州等機關報刊後，除新竹州《警友》與臺灣警察協會所編輯的《臺灣警察時報》外，各州機關報刊鮮少出現對客家的生活文化報導。因此，暫以客家人口最多的新竹州為例，分析警察機關與各業務警察對客家的社會記錄。

（一）新竹州警察機關的客家記錄

昭和12年（1937年）1月開始《警友》雜誌編輯部開始一系列的刊載有關警察對客家的研究，³⁵清代臺灣方志有關客家書寫對警察的客家描述仍有些許的影響，初期仍以客家源流、閩客關係、客家分布、客語的分類、產業等面相來介紹客家，此意味著隨統治時間的增加，警察機關對客家知識也有更細緻的掌握。

1、客家分布與歷史源流

新竹州警察機關對於客家的源流不再以「廣東」來概括之，能清楚區分客家四縣、海陸、大埔與詔安客的分佈，對於臺灣的客家地區的發展也能清楚指出其差異。例如，臺灣中部的詔安客因長期與閩人交流，而有明顯同化於閩南語的情形。³⁶警察對於閩客寺廟的興起也能看出其各自不同的地方意義。例如，福建部落以開漳聖王、廣澤尊王為信奉對象；客家則以奉祀三山國王為主，湄州媽祖、清水祖師閩粵皆有參與奉祀。日警也看出寺廟對地方客家族群的意義，寺廟的建立可藉此連繫同鄉、同姓、同業、讀書人及其他志同道合之人凝聚團結意識。³⁷

2、對客家教育的看法

警察機關認為客家有重視教育價值的傳統，新竹丘陵地的客家地區，由於耕地不足為了增加產量，投入大量人力將可用耕地充分利用，但為求將來有更好的發展，客家農村對於子女的教育亦不遺餘力，客家

35 《警友》雜誌為新竹州警察機關報，其主要的委員、編輯皆為警察機關首長及各部首長為主要成員。

36 編輯部，〈廣東族之研究〉，《警友》，號183（1937年6月），頁87－88。

37 編輯部，〈廣東族之研究〉，《警友》，號178（1937年1月），頁94－95

地區學風興盛。《警友》雜誌編輯部認為客家較閩人重視文教，實為整體臺灣經濟結構之問題，閩人掌握了多數臺灣商業先機，客家在財力及人力方面無法與閩人競爭，教育遂成了客家子弟向上流動的一個重要機會，不論投身教育或公職都是擺脫貧困現況的方式。³⁸

3、活躍的客家婦女印象

日警對於客家婦女除了傳統勤勞節儉的印象外，編輯部也觀察到客家地區的女權問題，相較於閩籍婦女，客家婦女是家庭經濟的重要成員之一，不論戶外農作勞動、丘陵採茶或同男子從事粗重的工作，客家婦女幾乎擔負了所有的大小事務。³⁹昭和3、4年間農民運動興盛之際，新竹地區農民組合支部委員對外演講，與會農民情緒高漲，常見與會客籍婦女踴躍參與，熱情不下客家男子。⁴⁰《警友》雜誌編輯部對客家婦女的社會行為是這樣解讀的：認為客家地區的經濟生產大多來自勞動力，婦女投入勞動生產分擔了男人的經濟壓力，也減少了婦女依賴男人的比率，客家婦女的獨立自主性也較高，使男子能夠安心出外發展事業。⁴¹

（二）新竹州各業務警察的客家敘述

新竹州各課業務分別由保安、行政、刑事、高等、衛生等警察分掌各項業務，對於客家的印象可能有其他業務警察所未能觀察的。因此，藉由各業務警察的客家描述爬梳完整的警察的客家印象。

1、保安警察的客家印象—勤奮與淫褻

新竹州保安課主掌社會安全預防保安業務，是最早研究客家的警察部門，保安課長友田藤太郎曾在《警友》雜誌發表其對於客家實際經驗的看法。茲節錄其優點部分的描述：

一、富勤勞心：廣東族體質比福建族健康，婦女勤勉，不論家事或戶外農耕雜役甚至粗重的台車工作都有客家婦女的身影，相較男子毫不遜色，反觀 閩籍婦女至大正5、6年間仍有纏足女子

38 編輯部，〈廣東族之研究〉，《警友》，號183（1937年6月），頁117 - 118。

39 編輯部，〈廣東族之研究〉，《警友》，號184（1937年7月），頁73。

40 編輯部，〈廣東族之研究〉，《警友》，號184（1937年7月），頁72。

41 編輯部，〈廣東族之研究〉，《警友》，號184（1937年7月），頁72。

深居家中。

二、愛好清潔：福建族目前常使用的浴室者少，就算有也是局部擦拭，而廣東族從以往到現在，上流家庭設有浴場，中流以下設有浴室，每日沐浴保持身體清潔。

三、恬淡勇敢：福建族陰險狡猾，廣東族性情恬淡，一旦承諾則有排除萬難達成的氣度。

四、質素勤儉：質素儉約是本島人民的通性，但福建族稍具拜金主義。

五、重友誼：福建族巧言令色時而誣妄他人，廣東族則少有虛言，情誼敦厚富團結心。⁴²

友田在評論客家優點的同時也指出客家的缺失，不外乎是迷信、排他思想、附和雷同以及婦女的淫亂行為。友田曾在評論客家的文章中提到「小心背後」⁴³，其意指客家表面順從但背後偷襲包藏禍心，見人多勢眾則倒向多者之中國遺風，利用自己服從他人之際，隱藏實力見機背叛，尤其經他人煽動後叛逆心態濃厚，又深具猜疑的個性，時為流言蜚語影響。⁴⁴

另外對於婦女的看法與先前的優點有些矛盾，友田指出婦女的缺點：「淫褻的陋習向來是本島婦女的弊病，廣東族在此惡風方面尤甚，相當家庭所養育的女子出嫁前保處子之身者少，中下流以下家庭賣淫之風，使一小錢可得之。」⁴⁵友田對此更轉個彎來譏諷客家，認為貞操是人倫必須尊重的道德大綱，而臺人夫妻之間能偕老同行者少，貞操觀念淡薄，時而衍生社會犯罪，此皆為不倫之示範。⁴⁶

2、刑事警察的客家描述—迷信、愚昧

刑事課長藤木親壽認為客家迷信程度很高，平時若身體微恙動輒求

42 友田藤太郎，〈保安警察與廣東種族〉，《警友》，號182（1938年1月），頁123 - 126。

43 友田藤太郎，〈保安警察與廣東種族〉，《警友》，號182（1938年1月），頁121。

44 友田藤太郎，〈保安警察與廣東種族〉，《警友》，號182（1938年1月），頁120。

45 友田藤太郎，〈保安警察與廣東種族〉，《警友》，號182（1938年1月），頁126。

46 友田藤太郎，〈保安警察與廣東種族〉，《警友》，號182（1938年1月），頁125。

助於鬼神，寧可棄醫藥而就拜神問卜，甚至做出有違理性之行為。為此藤木列舉幾項客家族群常犯的舊慣違警事由：

- 一、正月15夜盜採他人之青菜可保來年之幸運。
- 二、11月1日吹西風盜匪多。
- 三、盜或其他犯罪前先擲筊看否決為聖筊與否，有助犯行成功與否。
- 四、死產兒放水流，下次產子則奶水充足。
- 五、早產兒死亡者將其遺棄在海、川、池或沼澤中，下次會較早再妊娠。
- 六、遭竊者燒香及銀紙可見賊人踪跡。
- 七、行走中頭頂中鳥糞時會生病又會犯罪。⁴⁷

藤木所指出的客家迷信的負面描述，可看到日人對於客家生活習俗的掌握。一般客家社會中對於犯罪者除了依照法律處理外，也有客家舊慣的私處置行為。藤木也列舉出：

- 一、不小心放牧傷他人的田畑時，要以金花、爆竹、蠟燭等向被害人謝罪。
- 二、盜取他人青苗者要以金紙、爆竹向被害者謝罪。
- 三、盜取他人財物者被罰在廟門日掛1丈2尺的紅布。
- 四、以馬布（月經布）、煙管等毆打別人最為忌諱，除依法處罰外，還要以12圓及素麪做為謝罪。
- 五、同莊之人偷竊同莊者，罰其在土地公前以金銀紙、爆竹、蠟燭及香等做為謝罪之用。
- 六、誹謗他人者被罰以金紙、爆竹、蠟燭並設酒擺宴請戲班，做為恢復毀損名譽之用。
- 七、吵架之加害者被罰以6尺紅布及提燈一對奉納廟宇，提燈上並書寫奉納者的姓名及事由使大眾週知。

47 藤木新壽，〈從刑事警察上來看廣東種族（2）〉，《警友》，號190（1939年1月），頁87 - 88。

八、農曆正月賭博勝敗可測一年中的運氣。⁴⁸

針對客家這些因迷信或因舊慣的犯罪行為，日警雖無法完全掌握這些迷信的歷史原由，但從警察掌握迷信及舊慣犯罪的表面因素，說明了日警對客家社會脈動的瞭解。然而，由新竹州及其他州的犯罪統計數來看，並無法斷言客家迷信犯罪偏高，僅能代表藤木以昭和9到10年（1935 - 1936年）間犯罪統計數，做為分析樣本之部分結果。參閱表3。

表3：新竹州迷信犯罪統計

年分	犯罪件數	犯罪人（客籍）
昭和9年	4	4
昭和10年	3	3

資料來源：《警友》，號183（1938年6月），頁126。

3、行政警察的客家敘述—婦女的勤儉、慍悍

行政警察與人民生活接觸最為頻繁，舉凡臺人的衣食住行都包括在內。因此，客家地區的行政警察對於客家的看法勢必有別於一般警察。在《警友》雜誌中署名老警察官的作者，就其曾經在閩客地區擔任管區警察的經驗指出閩客婦女的社會生活文化的不同。⁴⁹作者雖然指出客家婦女有剽悍的一面，但對於其勞動的美德亦十分讚許，一般客家農家都會自種蔬菜自用，多餘的乃擔負街市販賣，作者以關西某富有50萬資產、具社會地位、對公共事務盡力之家庭為例，其家之婦女平日乃擔菜外賣，將所得之錢捐助社會公義之用。⁵⁰

參、日本學者與媒體對客家的認知

總督府研究臺灣史之目的不外乎治理臺灣之用，及引領內地日人認

48 藤木新壽，〈從刑事警察上來看廣東種族（2）〉，《警友》，號190（1939年1月），頁88 - 89。

49 老警察官，〈廣東種族的基礎見聞〉，《警友》，號194（1939年5月），頁101 - 103。

50 老警察官，〈廣東種族的基礎見聞〉，《警友》，號194（1939年5月），頁101 - 103。

識臺灣，此舉也引起民間學者的共鳴，有關臺灣的研究如雨後春筍般展開。日治時期的媒體對客家的報導也呈現出有別於學者對客家的描述。

一、日本學者的客家認知

日本領臺之後臺灣總督府大張旗鼓舉辦多項臺灣調查活動，⁵¹此一系列的調查活動，總督府不僅獲得實質的參考數據，更帶動了日人全面研究臺灣的風潮。民間學者對客家的描述似乎比官方有較大的論述空間，茲就歷史的分期來說明其印象的改變。

（一）陌生與負面的客家描述（1896 - 1917年）

日本人對於「客家」的看待又是如何呢？以小川琢治《臺灣諸嶋誌》為例，此為小川還在帝國大學理科學系讀書時，也是日本剛佔領臺灣的翌年1896年出版的，其中與客家相關者，有如下記述：

支那移民中有稱之為客家（Hakka）的種族。…此種族多居住於廣東，土著人民因此視其為外來種族加以排斥，客家之名稱。此種族的特性以慄悍勤勉能耐勞役之苦…近時對抗我師，有頑妄之，土匪者抵屬於此種族。⁵²

日本對客家的概念與今日「義民」的形象似乎有些差距，主要在於乙未之役後在臺零星抗日事件，客家族群參與的頻率高、抗爭也較激烈，以統治者的立場，「客家」可謂奸險頑劣之徒，時有以「土匪」等字眼看待之。小川在撰寫《臺灣諸嶋誌》時，日本的臺灣經驗不多，不只小川本身，其他日本人也幾乎沒什麼臺灣生活經驗，大部分的著作都是參考中西文獻。日人對於「客家」的印象大多還是直接來自清代方志的影響，茲將日治時期的臺灣相關研究中與客家有關之著作簡要整理如下參閱表4。

51 日本領臺之後即開始推行各項臺灣調查事業，例如「臺灣舊慣調查」、「土地調查」、「臺灣國勢調查」等。臺灣舊慣調查部分請參閱鄭政誠，《臺灣大調查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臺北：博揚，2005年）。

52 小川琢治，《臺灣諸嶋誌》（東京：東京地學協會，1896年），頁167 - 171。

表4：日本民間出版品中臺灣研究的客家印象

作著	出版品	年	有關臺灣客家的描述
小川琢治	《臺灣諸嶋誌》 ⁵³	1896	勤勉、耐苦，近時對抗我師，土匪者抵屬於此種族。
吉國藤吉	《臺灣島史》 ⁵⁴	1898	「客家」稱謂、荷蘭人與番人之通譯、流浪的族群。
村上玉吉	《臺灣紀要》 ⁵⁵	1899	以客家（hakka）做為族群稱謂，性情慍悍勤勉。
石坂莊作	《台嶋踏查實記》 ⁵⁶	1904	客家常居丘陵山地、分類械鬥、服儀有別閩族。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對於民間日人的客家的印象形成，以現今的看法確實有很大的落差，但從初期成果觀之，對於「客家」或「粵、廣東人」的稱謂，取決於學者採用的史料。但以清代臺灣方志為基礎來研究臺灣的概念大致確定，日人對於臺灣史料的掌握也日趨成熟。

（二）日人臺灣經驗的表述（1918 - 1930年）

日治初期伊能嘉矩以民政局囑託身份從事臺灣的歷史、地理及住民研究，同時致力向海內外蒐購有關臺灣的圖書，更進一步在臺徵求私藏的各類古文書，其後續的《臺灣文化志》對於臺灣客家歷史面貌也有清楚的描繪。伊能嘉矩蒐集了大量清代方志做為研究臺灣的基礎，並加上其對臺灣的實際田野調查，對於臺灣客家的看法已開始有別於清代臺灣方志的論述，但清代的方志及文獻也左右了其部分的想法。施琅的「渡航三禁」成為支持伊能氏客家晚來之說的依據，對後續的日人客家研究有廣泛的影響。雖然伊能氏對於客家並未加諸自己的看法，但伊能嘉矩在《臺灣文化志》中介紹客家族群性時，以《鹿洲初集》的「其志力田謀生」、「置產贍家」⁵⁷來說明臺灣的客家族群，似乎間接地呈現出他對客家的歷史觀感。

53 小川琢治，《臺灣諸嶋誌》（東京：東京地學協會，1896年），頁66 - 169。

54 吉國藤吉譯，《臺灣島史》（東京：富山房，1898年），頁4 - 5。

55 村上玉吉，《臺灣紀要》（東京：警眼社，1899年），頁94。

56 石坂莊作編，《台嶋踏查實記》（臺北基隆：石坂莊作，1904年），頁192 - 198。

57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臺北：南天，1994年），頁142。

廣松良臣為早期總督府招聘來臺的學者，後任職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長期居住在臺灣，其有鑒於臺灣納入日本領土20餘年，但一般日本人對於臺灣仍存有昔日刻板負面的印象，作者自許對臺灣有深切的了解，期望更多日人來臺投資發展，因而撰寫《帝國最初的殖民地臺灣的現況－附南事情》做為向內地介紹臺灣之用。廣松一系列的介紹臺灣之經濟、社會、資源開發等，並針對向來為日人最為擔心人（番）的部分做說明，其中也提到漢人族群有關「客家」的部分，作者仍以「粵」或「廣東人」稱呼客家，並簡單提到粵人來臺時間較閩人晚、人數少，所居地區也較閩人環境差、與閩籍素有嫌隙、生活自成一格、兩族語言風俗有異、相互婚嫁者少等。⁵⁸從廣松短短的兩頁的客家描述約略可知，作者對於客家的看法還是沿用清代臺灣方志粗略的描述，但其自詡對臺灣的了解，對於僅次於閩南族群的客家的描述卻是如此陌生，不難想見一般日人對於漢人所謂的「客家」或「粵」何其生疏了。經過日本20幾年的統治，整體而言，日人已有不少臺灣經驗，但有關客家的內容依舊不够廣泛。整理如下參閱表5。

表5：1918－1930日人臺灣研究中的客家描述概要

作著	出版品	年	有關臺灣客家的呈現
廣松良臣	《帝國最初的殖民地》 ⁵⁹	1918	分類械鬥，閩粵不睦，生活自成一格。
鈴木串字翁	《臺灣全誌》 ⁶⁰	1922	閩粵分類械鬥，各械鬥地區及時代。
秋澤次郎	《臺灣匪誌》 ⁶¹	1923	粵籍臺灣分布狀況，族群性格輕舉妄動、附和雷同。
山崎繁樹	《臺灣略史》 ⁶²	1927	渡般三禁影響粵人來臺。
伊能嘉矩	《臺灣文化志》 ⁶³	1928	渡航三禁客家來臺，南遷下淡水溪開發。
山根勇藏	《臺灣民族性百談》 ⁶⁴	1930	分類械鬥的因素，婦女的勤勉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58 廣松良臣，《帝國最初的殖民地臺灣的現況－附南事情》（臺北：臺灣日日新報，1919年），頁196－197。

59 廣松良臣，《帝國最初的殖民地臺灣的現況－附南事情》（臺北：臺灣日日新報，1919年），頁196－197。

60 鈴木串字翁，《臺灣全誌》（臺北：臺灣經世新報，1922年），頁175－176。

61 秋澤次郎，《臺灣匪誌》（臺北：松田書店1923年），頁19。

62 山崎繁樹，《臺灣略史》（東京：室文館，1927年），頁72－74。

63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臺北：南天，1994年），頁142。

64 山根勇藏，《臺灣民族性百談》（臺北：杉田書店，1930年），頁89。

（三）廣泛的客家研究（1931 - 1945年）

高雄州內埔公學校長松崎仁三郎編著《嗚呼忠義亭》，作者對於南臺灣六堆義民的敘述可謂詳實，從六堆客家原鄉嘉應州到客家來臺下淡水開墾之情況，松崎更蒐錄了客家在臺灣參與的大小戰事，包括乙未之役時與日軍的戰役共29次。⁶⁵其中松崎為客家在明治28年抵抗日軍登臺之役，做了一個較平衡的歷史敘事，認為改替之際六堆大總理舉人李向榮忠於前朝，說服各堆總理出兵援助劉永福，此為客家人忠義思想之故。

作者雖無正面評論客家的抗日，但從後續一篇〈附兒玉總督巡視〉之文即可知，作者借兒玉對忠義亭的評論來代替自己的看法。明治33年（1900年）兒玉總督南部巡視時，臺灣縣參事李廷光（萬巒人）隨從巡視忠義亭，當時內埔公學校畢業生代表鍾幹郎出門迎接。總督蒞臨忠義亭痛見忠義亭荒廢，屋頂已生茫草而感嘆，對隨行人員說：「梯子拿來，我上去拔草」⁶⁶隨行者及地方人士聽聞莫不惶恐以對，兒玉有感而說：「忠義二字得來誠非容易，今後幾百年、此二字為子孫之規訓，亦為祭拜先祖靈之慰。」⁶⁷並訓令忠義亭管理人應妥善管理忠義亭。阿緱廳時代廳長佐藤謙太郎亦親赴忠義亭參與祭祀。⁶⁸

生田清範的〈振字戰亡將士祭文〉即推崇曾參與抵抗日軍登臺之步月樓之役的六堆副總理蕭光明，並讚許蕭光明對於在戰役犧牲的英靈，每歲春秋祭拜，其忠義精神足為後世之範。⁶⁹生田為陸軍步兵大尉為中階軍，其以署名方式來讚揚曾參與抗日的臺人，視抗日戰亡臺人為「戰亡將士」，不再以初期的「匪」來論述臺人，可視為日人急欲收編臺人的作法。

松崎巧妙引用了兒玉總督的話及其他日人對客家看法，為日本對客家盡釋前嫌之恩典，拉近客家族群與日本的距離，並為客家當時的歷史

65 松崎仁三郎編，《嗚呼忠義亭》（臺北：盛文社，1935年），頁135。

66 松崎仁三郎編，《嗚呼忠義亭》（臺北：盛文社，1935年），頁135。

67 松崎仁三郎編，《嗚呼忠義亭》（臺北：盛文社，1935年），頁134 - 135。

68 松崎仁三郎編，《嗚呼忠義亭》（臺北：盛文社，1935年），頁252。

69 生田清範，〈振字戰亡將士を祭る文〉，收錄於松崎仁三郎編，《嗚呼忠義亭》（臺北：盛文社，1935年）。

做一辯護。松崎認為客家忠義思想符合日本武士忠義之思想，並舉日本元祿時代47士之事，明治天皇嘉勉忠義壯舉為例，並論之：「堅く主従の義を重んじ仇を復して法に死し，人をして感奮興起せしむる忠節を嘉す。」⁷⁰

整體而言松崎對客家評論是：「性剛建質素，勤勉直情、專心學藝者多、就學率高」⁷¹，似乎較明確地反應出日人對客家的實質印象。但日治末期有關臺灣研究中的客家描述，大致上還是停留在一般的客家分類械鬥的歷史刻板印象，但已有一些較廣泛的客家研究。整理如下參閱表6。

表6：臺灣研究中的客家印象（1931 - 1945年）

著作	出版品	年	有關客家的描述
藤崎濟之助	《臺灣全誌》 ⁷²	1931	閩粵分類械鬥。
臺灣農友會	《臺灣農事報》 ⁷³	1915 - 1942	客家的犧牲豚飼養方式研究。
臺灣畜產協會	《臺灣之畜產》 ⁷⁴	1933	新竹州義民祭犧牲豚報導。
松崎仁三郎	《嗚呼忠義亭》 ⁷⁵	1935	南部忠義亭客家族群忠義精神的褒揚。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二、日治時期臺灣媒體的客家報導

從新聞報導可以觀察到臺灣社會對不同區域的「客」有不同的描述，日日新報做為官方的對外發言的御用報紙，多少也代表了日人對臺灣社會的觀感。因此，從報紙與雜誌有關客家的報導，即可一窺日人對客家的印象。一般而言，日人仍多以「粵」代替「客家」做為介紹，對客家族群的社會報導正負不一。

（一）報紙的客家報導

70 明治元年明治天皇派特使至泉岳寺之賜語，嘉勉義士之行。筆者中譯：「堅持以重義法理報仇之死，此忠義節氣值得令人興奮嘉許」。參閱松崎仁三郎編，《嗚呼忠義亭》，頁286。

71 松崎仁三郎編，《嗚呼忠義亭》（臺北：盛文社，1935年），頁294。

72 藤崎濟之助，《臺灣全誌》（東京：中文館書店，1931年）。

73 小野新平，〈桃園管下的養豚概況〉，《臺灣農事報》，號47（1908年9月），頁39。

74 〈本年犧牲豚〉，《臺灣之畜產》，卷1號9，（1933年9月），頁130。

75 松崎仁三郎編，《嗚呼忠義亭》（臺北：盛文社，1935年）。

客家給予一般人的印象不脫勤儉、耐勞等印象，日治時期報紙報大致也是此類正面的報導：

粵族男女力耕，生產多而費用廉，由佃人變為業主者比比皆是。閩人男女。多不生產物，費用亦多，閩人土地之落於粵人手者年又一年。當今之計，為閩人鬥善後者。宜急節減其冗費，男女擇適宜之職而獎勵之。化不生產為生產的。⁷⁶

對於位居族群少數的客家而言，擁有自己的土地是確保長久發展的基礎，在流動頻率極大的農業社會，相較於閩人商業流動性優勢，固守土地生產成了客家族群首要選擇。客家族群在經濟生產的態度是，男女老少全部無償勞動投入生產行列，尤其是婦女對於客家族群的經濟亦有相對大的助益，也有正面的評價：「新竹街3,000餘戶，福建種族，最占多數，然皆纏足深居。不如粵族婦女，能與男子同其操作。雖其中有學習剖通草。製銀紙。養雞豚。以為補助家計。」⁷⁷

（二）義民祭的評價

1、正面的義民祭報導

新竹地區的義民祭飼養犧牲豚（神豬）成了報紙每年7、8月時的報導項目。⁷⁸報導內容正面讚賞義民祭對地方營造團結、繁榮與富庶社會氣氛，並對民眾熱衷投入犧牲豚的養殖爭取榮譽的社會現象表示讚許。客家的犧牲豚的養殖更引起官方的注目，每年新竹義民祭的神豬比參皆邀請官方相關事業技師到場評審。⁷⁹義民祭盛大犧牲豚陣頭也吸引了《臺灣農事報》針對犧牲豚養殖法來做介紹，明確地在客家地區（平鎮）的三坐屋庄及宋屋庄進行犧牲豚的養殖調查，並且制定了評定犧牲豚優劣標準，以及飼養飼料的選擇及方法。⁸⁰

76 「粵族男女力耕」，《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號4,817（1911年10月10日），第1版。

77 「新竹通信－擬興女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號4,025（1911年8月7日），第1版。

78 參閱《臺灣日日新報》1911/9/01；1921/08/15；1924/11/04；1925/09/06；1926/10/07；1928/09/05；1930/09/04發刊日報。

79 「犧牲豚獎勵受賞者」，《臺灣日日新報》，號4,161（1911年9月18日），2版。

80 小野新市，〈桃園管下の養豚概況〉，《臺灣農事報》，號4（1908年9月），頁35。

大正13年（1924年）新竹新埔枋寮擴大義民祭，參拜人數高達5萬人以上，除了大橋郡守外也邀請總督的島田彌市與高澤壽技士擔任評審以及其他官員蒞臨盛會，並舉辦犧牲豚比賽，當年首獎為638斤犧牲豚，當地與會參與連庄祭祀的犧牲豚則高達500頭，犧牲羊亦有400頭。⁸¹總督府及地方官員對於客家地區大肆慶祝的義民祭並沒有任何反對之意，後續幾年的慶典規劃及費用更勝前期。昭和3年新埔義民祭的犧牲豚更高達2,000多頭，合計祭祀經費更高達15萬元之多，參賽犧牲豚首獎亦高達898斤之譜，名列十名之犧牲豚也有804斤重，較日治初期犧牲豚重200斤之多。⁸²新竹州客家義民祭反映出客家地區富裕的生活環境，不僅代表地方經濟穩定的成長，也是地方官員藉此向上級證明其經營地方的成效。⁸³

2、鋪張浪費—負面報導

隨著日本對外關係的緊張，日人對於新竹州客家的義民祭也有不同的看法，曾經被視為活絡地方經濟代表地方富庶的義民祭，在日本軍國主義對外盛行之際，官方對義民祭的活動有不同的態度來解讀，認為客家義祭鋪張浪費。昭和8年（1933年）新竹州即出現廢止義民祭犧牲豚活動的聲音，中壢郡守中尾、新竹州畜產技手今村則認為義民祭的盛大的犧牲豚祭典應該廢止，並要求郡內的保甲落實要求。⁸⁴日人小野新平更不客氣的指出，義民祭完全是出自臺人宗教上的迷信愚昧思想，並從畜牧的角度分析這種犧牲豚的飼養方式有礙畜產發展，並從佛教的思想上來說明義民祭的缺失。⁸⁵

中壢郡警部補平松亦以不衛生為由，認為在盛暑之際犧牲豚及其他

81 「褒忠義民廟大祭犧牲豚500頭最大646斤詣者5萬人以上」，《臺灣日日新報》，號8,718（1924年8月22日），2版。

82 「新竹義民廟祭典供物之犧牲豚2,000餘頭以上其他合計價格15萬圓」，《臺灣日日新報》，號10,093（1928年9月5日），2版。

83 昭和5年新埔枋寮義民祭，新竹州內務部長、警務部長、教育課長、新竹市尹、新竹警察署、郡守、州協議會員、新埔庄長等與會參加。參閱《臺灣警察時報》，號192（1931年11月15日），頁9。

84 「建安宮の祭典犧牲豚を廢止し代りに養豚品評會を開催」《臺灣日日新報》，號11,880（1933年2月20日），3版。

85 「巧利的陋習冠婚喪祭時の犧牲豚の検討宗教上自己迷想の打算主義産業上牧畜改良の大阻害／佛教思想より見たる犧牲の價值」《臺灣日日新報》，號11,899（1933年5月23日），5版。

牲禮在日下曝曬有衛生之慮。⁸⁶昭和9年（1934年）中歷郡守森田即要求居民犧牲豚的代用事宜，並認為應將養豬的技術增進在畜牧業上。⁸⁷官方大力反對犧牲豚用在義民祭中，但吊詭的是官方並不反對犧牲豚的養殖方法，曾多次參與義民祭犧牲豚評審的技手今村也認為應將犧牲豚的養殖方法普及，以便增加肉品產量。官方更大力呼籲新竹地區居民將犧牲豚的養殖方法擴大普及。⁸⁸

3、客家山歌的評價

日治初期日人對於客家採茶戲即帶有殖民者優越的偏見，從官方報即可一窺其態度，《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採茶戲者係粵人為之，其所演唱大抵淫污最能，誘人子弟彼迷途敗俗傷第莫此為甚。」⁸⁹、「本島最傷風敗俗者莫如演唱採茶故事…少年弟子輩見採茶旦眉目送情，無不為他所惑或擲買笑之金。」⁹⁰另一篇報導更清楚描繪客家採茶戲的經營模式：

本島俗採茶戲固相傳久矣，而風俗不古人類不齊，近用女人唱演採茶，蓋此戲起自粵人，其夫唱而婦亦隨，近見枋隙街黃昏之後即有粵人唱歌於戲枱中，而佃戶溪丁恒以銅錢擲之盤中，每夜有數百人之多，噫斯風意不可滅歟。⁹¹

在殖民者強勢文化的推行下，以及對傳統臺人戲曲表演文化之負面評價下，似乎也影響臺人對自身文化的看法，昭和6年（1931年）陳鏡波對於時下的歌仔戲則持否定的態度，認為歌仔戲為因應下層階級之流所好而有的演出，夾雜唸歌並配以南北管樂純屬消解下流階層人士勞動之慰，其詞淫穢盡以男女之慾為能事，水平之低劣。⁹²

86 「犧牲豚の改善實行に決す」，《臺灣日日新報》，號1,878（1933年2月18日），3版。

87 「犧牲豚の代りに肉豚品評會開催東勢建安宮の祭典に部落民も漸く目覺む」，《臺灣日日新報》，號12,870（1934年3月9日），3版。

88 「犧牲豚の改善實行に決す」，《臺灣日日新報》，號11,878（1933年2月18日），版3。

89 「傷風敗俗」，《臺灣日日新報》，號587（1900年4月19日），版3。

90 「演唱採茶」，《臺灣日日新報》，號394（1901年8月24日），版4。

91 「茶戲興唱」，《臺灣日日新報》，號1,518（1901年11月9日），版4。

92 陳鏡波，〈台灣の歌仔戲の實際的考察と地方青年男女に及ぼす影響〉，《台灣教育》，號346（1931年5月），頁63。

肆、分析日人對臺灣客家印象的形成

一般而言，日治時期臺灣各地之間區域流動並未如現代熱絡，客家多數為農業生活的特質，除地方官吏、警察、教師等，一般學者若非親臨客家地區，實不易發掘客家的生活文化。因此，藉由日本官民對客家的印象來分析日人客家印象形成。

一、沿用清代臺灣方志有關客家事務的紀錄

（一）負面史料的沿用

從日人的臺灣研究可知，除客語外，並無以客家為主體之研究，即便是南洋或華南的客家研究也是整體研究的項目之一。在經歷日本統治30餘年，許多日人文史編纂者對於所謂的「客家」仍不熟悉，清代的方志及日治初期的官方報告成為學者方便取得的材料，以此充數。換言之，日治時期對於臺灣的客家研究並未形成一股風氣。在這種研究氛圍下，客家研究僅為陪襯的角色，沿用固有的史料及文獻，甚至形成抄襲。藉由日人對清代臺灣方志及文獻的引用概念看，在日本統臺灣的50年，有近40年時間之長，日人對於客家的歷史敘述沒有大幅的改變。茲列舉日人臺灣著作，整理如下參閱表7。

表7：日人對清代臺灣文獻客家書寫沿用的概要

作者	清代臺灣文獻	客家書寫概要	概念沿用
藍鼎元	〈與吳觀察論治臺灣事宜書〉，《治台必告錄》	「廣東饒平、程鄉、大埔、平遠等縣之人，赴台傭僱佃田者謂之「客子」：每村落聚居千人或數百人，謂之「客莊」。客莊居民，朋比為黨。」 ⁹³	武內貞義，《臺灣》，頁671。
			石阪莊作，《臺灣島踏實記》，頁198。
黃叔璥	〈朱逆附略〉，《台海使槎錄》	「辛丑變後，客民與閩人不相和協。再功加外委，數至盈千，奸良辨：喜拳勇，喜格鬥，倚恃護符，以武斷於鄉曲，保正里長，非粵人不得承充；而庇惡掩非，率徇隱不報。」 ⁹⁴	《臺灣料稿本》，頁220 - 222。
			山崎繁樹《臺灣史》，頁218。
黃叔璥	《台海使槎錄》	「終將軍施琅之世，嚴禁粵中惠潮之民不許渡臺。蓋惡惠、潮之地素為海盜淵藪而積習未忘也。琅歿漸弛其禁，惠、潮之民乃得越渡。」 ⁹⁵	《臺灣史料》頁293。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頁145。
			村上玉吉，《臺灣紀要》頁94。
			武內貞義，《臺灣》，頁48。
			山崎繁樹《臺灣史》，頁174。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從上述概要可知，日人對於客家的來臺歷史源流並沒有進一步的探討，施琅的渡航三禁成了眾多日人沿襲的重要依據。另外臺灣方志中負面的客家書寫也影響日人對於分析閩客分類械鬥原由的探討，日人在分析閩客械鬥時，整體上仍認為起因於臺人的愚昧無知，⁹⁶但在討論客

93 藍鼎元，〈與吳觀察論治臺灣事宜書〉，《治台必告錄》，（臺灣：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97年），頁58。

94 黃叔璥，〈朱逆附略〉，《台海使槎錄》（臺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頁93。

95 黃叔璥，〈赤坎筆談〉，《台海使槎錄》（臺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頁92。

96 臺灣守備混成第一旅團，《臺灣史料》（東京：同志社，1900年），頁294。

家時仍有一些對客家的刻板成見，認為客家在地理上受番族與閩族的包夾，養成慍悍、團結、附和雷同、逞強鬥狠的性格。⁹⁷換言之，日人認為客家的族群性格亦是導致清代分類械鬥的因素之一。上述日人的看法，在北埔事件之後更印證日人內心的看法。客家族群在日人眼中已被日人貼上負面的標籤，日人事後檢討，認為此乃客家族群性格使然，在《臺灣日日新報》甚至出現一篇評論客家的負面報導，參閱圖2，中文譯文如下：

●廣東部落之犯罪傾向 本島人中廣東部落民は一種異なる性格を有し善く云へば硬骨にして決斷力に富み且つ義侠的行動を取て爲す底の美風あるも悪く云へば固執にして到底與みすべからざる極端の行動にも出ること往々にして之れある一種の蠻風を存する點もあれば從て彼等部落の罪質も自ら他と其趣を異にし殊に著しき現象は新竹法院出張於て扱ひたる刑事事件中窃盜罪を以て第一位なし之れに亞ぐるは毆打創傷罪なるが元來本島一般の狀態より見れば窃盜に次げる賭博及阿片令の犯罪が最も多數を占むるを例とするに同出張所管内に於てのみかかる異例を見たるは要するに彼等廣東部落が山地に居住して平素粗暴なる行動を好むの習慣と前記先天的特性との發せに外なざるべしと云ふ因に遺般の北埔事件の如き大兇惡を敢行したるが如きも亦畢竟之等の系統に胚胎するものと見て大過なかるべし

圖2：《臺灣日日新報》剪報

資料來源：「廣東部落と犯罪傾向」，《臺灣日日新報》，號2,898（1907年11月28日），版3。

本島人中廣東部落民具有一種異於其他族群性格，說好的評論是具有硬骨、富有決斷力，且有俠義精神的良好風範，壞的批評是頑強固執，不與人合作的極端行動之野蠻性格。其部落犯罪傾向與其他族群殊異，新竹法院出張所受理刑事案件：一般以竊盜案件最多，其次賭博案，再次鴉片案；而客家族群竊盜案居首，其次則為毆打傷害罪。廣東族居住山地，平素行動粗暴似已成性，此次北埔事件亦源於廣東族之特殊性格

97 臺灣守備混成第一旅團，《臺灣史料》（東京：同志社，1900年），頁295 - 296。

所致，如此兇惡的暴行亦歸因其民族系統使然，此說並不為過。⁹⁸

（二）非重點研究的族群

從日治末期昭和18年（1943年）發行之《民俗臺灣》來看，該雜誌以臺灣本島民俗為主，鄉土的歷史、地理、自然等作為記載的重點，投稿的對象不論臺人或日人都十分踴躍。⁹⁹《民俗臺灣》的發行因戰爭之故，僅發行3年共40期即宣告結束，其中蒐集了有關臺灣民俗文物資料可謂十分豐富，但有關「客家」的報導仍十分貧乏，日人僅有岡田俊介的〈義民廟的由緒〉與中村哲的〈分類械鬥與復讐〉。前者內容不出一般描述客家義廟源流；後者分析分類械鬥對族群日後的影響，並未針對客家在分類械鬥中所扮演的社會角色加以說明，兩者對於日治時期的客家也沒有進一步的了解，仍舊停留在歷史文獻的引用。在40期當中有幾篇是臺灣人所寫，如「客家婦人」¹⁰⁰、「臺灣農村的廣東人」¹⁰¹等，這兩篇有關客家印象，雖然出於臺灣人的自我描述，但實際上是無法反應出整體臺灣的客家面向，充其量只是概要式的介紹。

從《民俗臺灣》雜誌對客家的生活文化的描述，篇幅少而內容淺，日人對客家概念仍舊停留在分類械鬥及義民廟的祭典源流。這似乎反應出日人對於臺灣各族群文化研究重點及優先順位的考量，在眾多研究中，閩南族群可謂數量之最，而番族群的研究是重點研究項目，日治末期以高砂義勇隊之名參與日軍行動，可謂總督府在臺番政的進一步突

98 轉載楊毓雯，〈北埔事件之原因探究〉《北埔事件一百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竹：客家臺灣文學會，2007年），頁125；原文出處「廣東部落と犯罪傾向」《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11月28日，版3。<http://p8089-140.115.130.201.ezproxy.lib.ncu.edu.tw/LiboPub.dll?Search1>

99 金關丈夫、富田芳郎、國分直一、中村哲等這些都是知名的臺灣民俗研究學者，還有臺灣知名學者如杜聰明、吳守禮等人都曾在雜誌中發表文章。參閱《民俗臺灣》（臺北：東都書籍臺北支店，1943 - 1945年）。

100 描述客家婦人日常的生活作習細節，如除了要負責家中舉凡三餐、洗衣、養豬、外則必須兼負外頭田園事務，作者以「沒閑、沒閑」來形容客家婦人度過一生。參閱賴阿龍，〈客家的婦人〉，《民俗臺灣》，4：9（1944年9月），頁39 - 40。

101 作者對客家農村生活的描述，對於客家農村大家庭的生活習俗有進一步的介紹。參閱謝氏春枝，〈臺灣農村的廣東人〉，《民俗臺灣（六輯）》（臺北：武陵，1990年），頁11 - 12。

破。此外《民俗臺灣》標榜以臺灣島內報導為主，但以當時日本對外關係的緊張，其中也穿插不少華南與南洋的民俗報導以利民眾了解。因此客家的議題在民俗研究當中並未明顯的呈現出來。

二、客家印象隨時局變動而改變

（一）優越的殖民者中心思想

殖民者的優越心態，對於有別於日本文化價值者，則以負面論述相待。客家山歌即為日人所不屑，客家婦女常年在田間或丘陵種茶，為解工作之苦時有山歌對唱之習俗或野台戲的表演，藉山歌或民謠來抒發情懷，歌詞內容不外乎以茶、山、情、愛等題目為主。尤其是情愛之曲，夫妻或男女朋友之間常藉由山歌的催化，把情意赤裸裸地傳達給對方，尤其山歌歌詞可隨意變化、即興創作，時有戲謔之詞脫口而出，原為餘興娛樂之用詞，流入外人耳裡則被視為粗鄙之詞。

客家山歌中確實是有一些描述男女情愛的歌曲，但實際上真如日人負面評論所言嗎？以客家山歌十八摸為例，茲節錄部分歌詞：「伸手摸姐摸到阿姐嘴唇邊，阿姐嘴唇紅連連；伸手摸姊摸到阿姐耳空邊，阿姐耳空聽得見。伸手摸姐摸到阿姐背囊邊，阿姐背囊好找癢……」¹⁰²對於這一類男女戀情、夫妻逗趣的歌曲被日人視為粗俗，真正原因可能不在歌詞而在於客家山歌的本質，也就是即興創作的詞性才是日人所不容之處。

客家山歌賦、比、興說唱方式自然可藉此一吐心中不滿，¹⁰³是否帶有反日思想，仍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官方否定三腳採茶戲，其本質上乃對於不符殖民政府所認定價值之文化排除，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日人似乎把一般坊間走唱營生的負面採茶戲，連接到一般客家山歌生活文化中，進而導致日人將負面評論與想法加諸在客

102 賴碧霞編著，《臺灣客家民謠薪傳》（臺北：樂韻，1991年），頁36。

103 楊兆禎著，《客家民謠》（臺北：育英，1974年），頁26。

家婦女身上，對照日本的性觀念，¹⁰⁴殖民者自身似乎有兩把尺來衡量臺日人民。¹⁰⁵

（二）隨時代變動而調整的客家印象

1、經濟產業力的利用

客家地區的義民祭對殖民政府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意義，在大正年間社會經濟勃興，官方大力參與義民祭祀活動，代表區域經濟的穩健發展。義民祭在經歷日本對外緊張關係後，日人對於客家義民祭已有一些反對的聲浪，認為客家義民祭每年宰殺數百頭生畜實屬鋪張浪費。¹⁰⁶新竹州政府對於客家義民祭也有不同的態度，昭和13年（1938年），新埔枋寮義民祭按例邀請新竹州的教育課長、新埔郡守及警察與會，官員在致詞時即針對義民祭活動提出改善方案，要求往後以糖果、水果為佳，將節省的經費奉獻國防或寄附社會事業。¹⁰⁷

《臺灣農事報》則針對義民祭犧牲豚的養殖方法做詳實的調查，以推廣臺灣養殖技術的升級。¹⁰⁸殖民者對客家的評價是建立在資源的利用性上，客家傳統文化生活價值端視當代的政治、經濟及國家政策來做為正負評價的依據。日人對於被殖民者的生活型態是選擇性的接受，對於有利生產的農作或耕作方式皆大力讚賞，並以等同日本文化規格之名，試圖將客家的文化納入日本的思想價值中。

2、戰時客家文化價值的收編

戰時臺灣社會上瀰漫一股為戰爭奉獻的風氣，學校亦以皇國精神教

104 日本男人對女人的依戀有著矛盾的情節，女人有母親及妓女的雙重性，在性的依賴認為妓女所提供的性是生活歡愉的事，若涉及到感情則觸及淫樂區的禁果，被視為不文明及粗魯的行為。參閱伊恩·布魯瑪著，張曉凌譯，《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北京：光明日報，1989年），頁89。

105 日人將性視為生活中的一種合同交易及其契約、賬單等，是生理需求。參閱郝漢祥著，《日本人的色道》（武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42 - 43。

106 「義民廟祭典に惡弊を一掃」《臺灣日日新報》，號13,860（1938年8月26日），版5。

107 「州内事情費典費を節約し國民獻會の榮譽」，《新竹州時報》，（1938年12月），頁78。

108 日人以新竹義民祭的犧牲豚的選種開始，以豬的口型、耳型、頭型、腰部身型、臉型的皺摺、蹄型、色澤等，並記錄飼料的類型，以及維持涼爽舒適的飼養環境等方法。參閱《臺灣農事報》，號47（1908年4月），頁35。

育為目的。¹⁰⁹昭和12年（1937年）日本發佈「國家總動準備概要」，將人力資源概分為身體、知識、道德，並以道德為根本。¹¹⁰新竹州保安課長友田藤太郎從臺灣的歷史來看客家，認為其具有高度的族群地域與國族意識，並富有犧牲的精神及公德心、知恩圖報、有關道路奉公的習慣等。¹¹¹友田指出若能在思想上改變客家，以其原有克苦耐勞的性格必有利為殖民政府所用，¹¹²將客家文化導入皇恩思想的一環，以目前社會榮景、人民的智、生命財產等視為皇恩之榮典。¹¹³而這種感念日本恩情的情懷，的確可以在一些老一輩人的身上看到，¹¹⁴並針對許多客家的缺點進行改造，例如：時間觀念、守時態度、賭博、殘忍性格等改造。¹¹⁵

3、日本核心文化的同化

松崎仁三郎對於客家義民精神的讚賞，對照日本當時對外關係，似乎不如表面那般單純，六堆客家忠義亭精神已非單純的民風善俗之表彰，松崎巧妙的利用教育將其與日本精神作連結，日治時期以臺灣本土人物做為歷史教育對象人並不多，松崎試圖將客家義民精神納入教育體系中，藉由自己校長之權，將早期阿猴廳時代參拜忠義亭之詞列為傳誦之歌，並在高雄州教育會議上提出客家義民之見解。¹¹⁶然而從松崎在《嗚呼忠義亭》的自序中隱約看到其試圖將這股客家義民精神轉化為軍國主義思想體制下：

109 公學校教育以國語敕語為基礎做為鍛鍊臺人成為皇國民的養成方法。參閱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2005年），頁113 - 115。

110 寺崎昌男編，《總力戰體制教育—皇國民「鍊成」理念實踐》（東京：東京大學出版，1988年），頁8。

111 友田藤太郎，〈保安警察與廣東種族〉，《警友》，號182（1938年5月），頁123 - 126。

112 友田指出客家富有敬天畏地的感恩性格，公益行善是一種感恩的行為，並觀察到新竹州地區原有主要道路都是清代官道，在過去國家資源無法持續維護道路橋樑時，客家居民素有自動奉公維修橋樑道路之風，成為地方善俗，明治36、7年以後地方平靖之後，地方警察督促保甲利用此民風修繕道路成效卓越。參閱友田藤太郎，〈保安警察與廣東種族〉，《警友》，號183（1938年6月），頁121。

113 於保昌，〈廣東種的研究（1）〉，號190（1939年1月），頁98。

114 戰時日人的公學校教育，注重臺人「忠義心」的培養，學問非教育的重點。參閱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2005年），頁245 - 246。

115 友田藤太郎，〈保安警察與廣東種族〉，《警友》，號182（1938年5月），頁81 - 83。

116 松崎仁三郎編，《嗚呼忠義亭》（臺北：盛文社，1935年），頁275。

我素以武士的精神做為學習，並大力鼓吹之於世，這也是臺灣初等教育界延續之事，想到臺灣社會現況如此緊切。…今青少人們對忠義亭的沿革、六堆軍功績等幾乎不解真相，而古稀之老者也未大聲疾呼，對忠義亭之知者之粵人日益稀少。因此，我以死馬之骨將六堆軍事活動、史蹟逸話、祖先遺德…將之合併於地方教化之殿堂中，宣揚其精神。」¹¹⁷

作者這番自序可謂文情並茂，以殖民者之尊來編纂客家義民史，總督府官員亦題字褒揚。¹¹⁸此舉使當地客家耆老與士紳對松崎及總督府莫不感激萬分，松崎此舉可謂一舉攬獲在地士紳的心，前清秀才時任長興庄庄長曾寶琛贈序：「自古識英雄者即英雄也，愛忠義者即忠義也。如西勢忠義亭前朝之古廟先世遺跡。」¹¹⁹對照日本對外關係，客家義民忠義為鄉的精神正是日人所需，將客家義民精神重新放大並將其與日本軍國主義結合。松崎對客家義民看法也許也有自出其個人對臺灣土地的情感，其對忠義亭提詩可見其文人的鄉土情懷：「腐木廢堂壁破危，里人積竹作垣籬，懷忠義士今何處，想起英魂淚滿碑」，以及其義民的評論：「義民憤起討公仇，百萬蒼生解暗憂，赫赫功勳神鬼泣，精忠貫日照千秋。」¹²⁰然而在戰時依官方依「人力資源」的作法上，客家義民的「忠義」精神符合總督府的教育目的與日本傳統文化，很難不令人懷疑日人之動機。

伍、結論

日人對於臺灣的研究依賴大量清代臺灣方志及西方文獻，乙未之役客家抗日之表現，實非日人可接受之大清義民。「分類械鬥」則成了日

117 松崎仁三郎編，《嗚呼忠義亭》（臺北：盛文社，1935年），頁2。

118 臺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臺北帝國大學總長幣原坦、臺北州知事野口敏治、高雄州知事西澤義徵等題字以褒揚客家忠義精神。參閱松崎仁三郎編，《嗚呼忠義亭》（臺北：盛文社，1935年），附頁無頁碼。

119 松崎仁三郎編，《嗚呼忠義亭》（臺北：盛文社，1935年），頁6。

120 松崎仁三郎編，《嗚呼忠義亭》（臺北：盛文社，1935年），頁269 - 271。

人初期了解客家的媒介，官方對客家的印象，也影響民間對於客家的印象。撰寫有關客家的描述之日本學者多數居住在臺北或日本，對於所謂客家的印象，實基於相關客家文獻，並非作者本身實際的了解。一般而言，客家乃被日本學者歸類同「分類械鬥」、「愚魯好鬥」之列。

媒體對客家的報導，一方面較忠實的反應當代客家現況，另外客家的勤奮務實、崇尚清潔與美感的生活，符合了總督府的時代政策。¹²¹客家因義民信仰而形成的另一項家畜事業「犧牲豚」，亦為執政者所關切，客家飼養神猪事業成為日人研究家畜的重點。義民祭成了日人進一步了解客家的媒介，但日人之出發點實以發展畜牧為初衷，而非出自於對客家文化的了解。

日人對臺灣客家從「匪」到「忠義」印象的轉變，端視時代背景改變。王泰升指出：「日人對臺灣舊慣的取捨，是端視何者對日本統治較有利，非純粹出於尊重臺人，日本當局亦是為作此項評估，才開始詳盡且客觀地調查臺灣舊慣內容。」¹²²戰時人力資源是確保日本勝戰的重要因素之一，民心歸向、道德力都是國家掌控的一環，客家傳統公益風氣、勤勞耐苦、忠義精神等，成為戰時日人急於收編的人力資源。在日本對外戰爭之際，褒揚客家義民精神，將日本武士忠義精神與客家義民精神連結，使其符合日本固有文化，有助於將客家社會資源收編於軍國主義思想的一環。

日警對客家的紀錄較實際的反應出日人對客家的印象，多為敘事性，缺乏學術性研究。但此類客家紀錄可以較真實地反應出當時日人的客家社會印象。新竹州警部補於保昌即坦言鮮少接觸有關客家的文獻，對於客家的印象大多來自勤務運作時。¹²³整體來說警察對客家看法褒多於貶，最為貼近實際日人的臺灣客家印象，主要為勞動生產、好貯蓄、低消費、好公義與尚義民忠義精神的傳統，符合殖民政府興殖產業報效國家的需求。

121 編輯部，〈廣東族之研究〉，《警友》，號124（1933年6月），頁117-118。

122 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年），頁105。

123 於保昌，〈廣東種的研究（1）〉，《警友》，號190（1939年1月），頁98。

陸、引用書目

一、史料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年。

《台案彙錄已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97年。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東京：刀江書院，1928年。

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第73期，

藍鼎元，《東征集》，臺灣：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97年。

藍鼎元，《治台必告錄》，臺灣：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97年。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臺灣：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

黃叔璥，《台海使槎錄》，臺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

二、專書

（一）中文

丁曰健，《治灣必告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97年。

James W. Davidson著，《臺灣之過去與現在》臺灣研究叢刊第107種，
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年。

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9年。

陳文達，《臺灣縣志》，臺北：大通書局，1987年

吳學明，《金廣福墾隘研究（上下）》，新竹縣：竹縣文化，2000
年。

戴國輝著，《臺灣結與中國結－睪丸理論與自立、共生的構圖》，臺
北：遠流，1994年。

賴碧霞編著，《臺灣客家民謠薪傳》，臺北：樂韻，1991年。

楊兆禎著，《客家民謠》，臺北：育英，1974年。

徐國章譯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南投：臺灣文獻，2005
年。

飯島典子，《近代客家社會の形成：「他稱」と「自稱」のはざま
で》，東京：風響社，2007年。

寺崎昌男編，《總力戰體制教育—皇國民「鍊成」理念實踐》，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1988年。

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臺
北：自立晚報，1992年。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2005年。

（2）日文

小川琢治，《臺灣諸嶋誌》，東京：東京地學協會，1896年。

江馬達三郎譯述，《臺灣史料（第上編）》，京都：村上勘兵衛，
1898年。

臺灣守備混成第一旅團，《臺灣史料》，東京：同志社，1900年。

後藤新平，《日本殖民政策一斑》，東京：拓殖株式會社，1921年。

鈴木串宇翁，《臺灣全誌》，臺北市：臺灣經世新報社，1922年。

伊能嘉矩，《領台十年史》，臺北：新高堂，1905年。

岡田東寧《臺灣歷史考》，東京：拓殖務省文書課，1900年。

廣松良臣，《帝國最初の植民地臺灣の現況－附南事情》，臺北：臺灣
日日新報，1919年。

村上玉吉，《臺灣紀要》，東京：警眼社，1899年。

藤崎濟之助，《臺灣全誌》，臺北：成文，1985年。

石阪莊作編，《台嶋踏查實記》，臺北基隆：石阪莊作編，1904年。

松崎仁三郎編，《嗚呼忠義亭》。臺北：盛文社，1935年。

臺灣總督府法務部編纂，《臺灣匪亂小史》，臺北：臺灣總督府法務
部，1920年。

管野秀雄，《新竹州沿革史》，新竹：新竹州沿革刊行會，1938年。

仲摩照久編，《日本地理風俗大系15（臺灣篇）》，東京：新光社，
1941年。

臺灣文化三百年記念會，《臺灣史料集成》，臺南：臺灣文化三百年記
念會，1931年。

三、期刊論文

李文良，〈清初臺灣方志的「客家」書寫與社會相〉，《臺大歷史學報》，期31（2003年6月），頁141 - 168。

李文良，〈從「客仔」到「義民」：清初南臺灣的移民開發和社會動亂（1680 - 1740）〉，《歷史人類學學刊》，5：2（2007年），頁1 - 38。

吳文星，〈日治初期日人對臺灣史研究之展開〉，《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輯》（1998年12月），頁2006 - 2016。

四、報紙雜誌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警友》

《臺灣警察協會雜誌》

《臺灣農事報》

《新竹州時報》

《人類學雜誌》

五、網路

「臺灣史料編纂委員會的創設」，《臺灣時報》，<http://p8080-140.115.130.210.ezproxy.lib.ncu.edu.tw/twjihoapp/servlet/completeOne?page=1>

Analysis of Japanese' Impression on Hakka Society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aiwan

Abstract

During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aiwan, the Taiwan Chronicle from Qing Dynas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the Japanese officials to understand about Taiwan. The facts and matters about the Hakka ethnicity that the Chronicle transcribed has also been the basis of their understanding on Hakka people. Later during the 50 years of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depictions on Hakka ethnicity in the official records that the Japanese made change over time. Records made by the Japanese police that reign over the Hakka people describe a much different picture than what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thought about the Hakka ethnicity.

As for Japanese citizens that lived in Taiwan, their 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Hakka ethnicity were based on impressions derived from government officials, but then grown to b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diverse after interacting with the Hakka people. The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back then has made continuous reports on the Hakka ethnicity, portrayed what Hakka society in general was like, which evidently showed Japanese's broad interests in the daily lives, cultural & business activities of the Hakka society.

This research looks into the two main sources which Japanese get their impressions on the Hakka ethnicity from :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s and daily experiences in living with the Hakka peopl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ists were relying on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s like the Taiwan Chronicle and those from the West, Japanese police on the other hand were replying on daily experiences with the Hakka people in acquiring a much more complete record on their lives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 hold positive impression about the Hakka society, such were been selected and shaped by the Japanese colonialists in forming an upbeat image on the Hakka ethnicity.

Keyword : Hakka concept, Hakka impression, The Qing Dynasty Taiwan
local chronicle, police, the Yimin festival

日治時期日人對臺灣客家的社會印象之研究

臺灣文獻

第六十三卷第三期